

# 北魏道武帝入主中原与胡汉融合的历程

张达志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When Emperor Dao-Wu, inaugurator of the North-Wei regime, entered Central China as a conqueror, he faced the problems to harmon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 and Han and to absorb the local tribes into his power system. The solving of such problems is the key of the success of the Hanist reform, which is carried out by Emperor Xiao-Wen. By investigating the actions of Emperor Dao-Wu on na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the Han gent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he harmonization between Hu and Han during the chaos period.

Key Words: North-wei Emperor Dao-Wu harmonization between Hu and Han

**内容提要**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人熟知,但北魏的开创者道武帝以异族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时,如何调整与汉族士人的关系,如何将地方大族重新纳入新的国家政权,是解释孝文帝汉化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考察道武帝在国家制度建设以及任用汉族士人方面的作为,探讨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异族政权初入汉地之际胡汉融合的历程。

**关键词** 北魏 道武帝 胡汉融合

**中图分类号** K239.21

**文献标识码** A

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把秦汉以来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瓦解为各自独立的集团;北方兵戈扰攘之际,汉人未能南迁的,都筑坞堡以自保。其结聚或以宗党、或以婚姻、或以佃户为核心,关系极为密切,组织极为胶固。坞堡宗族有它自己的政治、经济与家族主义,形成地方上强大的势力。胡人最注意的便是此等大族。<sup>[1]</sup>坞堡实际上代替了北方被打乱了的地方行政组织<sup>[2]</sup>,胡族政权入主中原,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地方上广泛存在的坞壁、坞堡。“以坞壁武装为后盾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sup>[3]</sup>

“魏晋以来的北方大族通过五胡以至北魏仍然在各地具有巨大势力。他们一般地分割土地,占

有户口,各族君主对于既得权益阶级,大族、士人以及堡坞豪帅照例采取怀柔合作的政策。”<sup>[4]</sup>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边疆民族进入长城之内后,在中国建立统治政权,与广大的汉族人民、基础深厚的汉文化直接接触,促使其自身文化发生转变。经过不同阶段的冲突与调整,最后融合为一。<sup>[5]</sup>拓跋政权作为较晚进入黄河流域的异族势力,对地方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因此不得不放任地方大族,承认其既得利益并与其合作,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对其进行吸纳与制约。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入主中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本文试图从道武帝时期的制度和用人两个层面考察拓跋政权初入汉地,将地方势力纳入新兴国家政权的历程。

## 一 制度

关于道武帝时期官制的具体变化,《魏书·官氏志》中有详细的记载,学者亦有精深的研究,如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溥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山崎宏《北魏大官》、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等论著,本文对此不拟深入探讨,仅仅关注与道武帝南进进程相关的官制问题。

拓跋珪登国元年至登国十年为代王,皇始元年称帝,至皇始二年,改元天兴,至天兴六年,再改元天赐,至天赐六年驾崩。北魏进入中原以前,政治制度基本上是空白,代王之下有南部、北部、外朝大人,与前代国的制度基本一致。

(登国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子宝来寇五原……(十一月)大破之……生擒……文武将吏数千人……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sup>[6]</sup>  
 参合陂大破慕容宝,吸收慕容燕政权中的汉族士人,通过俘虏仿效后燕政治制度,是拓跋政权制度建设的开始。

(皇始元年)秋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于是改元……己亥,大举讨慕容宝……九月……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sup>[7]</sup>  
 经过道武帝登国年间的征战,北魏的统治区域逐渐扩大,统治事务逐渐增多,拓跋与汉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原有的职官机构已不能满足新形势的需要。于是“始建曹省,备置百官,封拜五等,外职则刺史、太守、令长已下有未备者,随而置之”<sup>[8]</sup>,形成了仿晋三省制为主的外朝机构<sup>[9]</sup>。内朝与外朝两大职官机构并存,利用中原原有的方式进行统治。

(皇始二年)冬十月丙寅,帝进军新市……贺麟单马走西山,遂奔邺,慕容德杀之。甲申,其所署公卿、尚书、将吏、士卒降者二万余人……获其所传皇帝玺绶、图书、府库、珍宝,簿列数万……中山平。<sup>[10]</sup>  
 平中山,大量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熟谙中原制度的后燕官吏归附北魏,加之缴获大量后燕朝廷文书图籍,在文化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至此,吸纳汉族士人、仿效后燕制度、利用后燕书籍,北魏政治制度建设的条件基本成熟。日本学者溥添庆文考察了道武帝时代尚书省任职者的就任时间,发现皇始二年或“中山平后”任官的例子居多。

“当后燕的根据地中山失陷时,北魏将在后燕政权中任职的许多汉人纳入自己的官僚机构”;虽然尚书省的形式虽已建立,但缺乏合适的人选,实际上有些职位可能是有职无官。由此也可以想见,平定中山之后,广泛任用后燕的汉人官员到尚书省任职决非毫无道理”<sup>[11]</sup>。

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岂不以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治之,为国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务,意在兹乎?圣达经猷,盖为远矣。四年春,命乐师入学习舞,释菜于先圣、先师。<sup>[12]</sup>

太祖问(李)先曰:“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补王者神智。”又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sup>[13]</sup>

太学和五经博士的设立,使传授经学成为国家制度,汉族士人可以通过正常有效的渠道影响统治者,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可能为统治者所采纳。后来的崔浩在北魏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兴元年春正月)庚子,车驾自中山行幸常山之真定,次赵郡之高邑,遂幸于邺……帝至邺,巡登台榭,遍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彝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帝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抚军大将军、略阳公元遵镇勃海之合口。<sup>[14]</sup>

在邺、中山置行台,稳固了拓跋政权在中原核心地区的统治。

(天兴元年)六月丙子,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

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sup>[15]</sup>

“国号的选定,实际上反映出拓跋鲜卑是以代北作为其立国之基,还是向中原拓展而成为中原之主的问题”<sup>[16]</sup>,道武帝选择了后者,可以说是其入主中原的战略决策和政治宣言。

(天兴三年)十有二月乙未,诏曰:“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

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次日)丙申复诏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义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贪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

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郤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sup>[17]</sup>

“乙未诏书重在解释君权神授而不可侵犯的道理,丙申诏书则要在阐述君臣天定而不可逾越的原则。将二者结合到一起,正是内容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原理的文告,其中心思想无疑是要将以往的部落联盟中首领与酋帅的关系改变为封建的君臣关系。两道诏书不仅仅是道武帝个人意志的表达,而是北魏王朝要坚决施行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宣言。再结合尚书道武帝任用崔玄伯、邓渊、董谧、晁崇等汉族士人制定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典章的统治制度来看,乙未、丙申两道诏书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将平城政权纳入封建轨道的标志,它表明拓跋部的统治机器在北魏建国之初就从部落联盟转化成了封建集权性质的国家。虽然这具封建集权机器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这一转化实际上也表明拓跋部的社会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sup>[18]</sup>

另有观点认为:“诏书虽长,想传达的意旨却很简单:帝王之位乃天命所归,其他人万万不可有此非份之想,以免招致杀身灭族之祸,最为明智的作法就是不要在乎名位,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服务。然而,诏书固然具体表达了他的期望,却也相当程度地泄漏出他内心深处的疑惧,担心某些人不愿承认他地位的正当性。”<sup>[19]</sup>

笔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目前研究偏重强调道武帝任用汉人、采纳汉制的一面,渲染汉族士人参与北魏政权建设的积极功效。“没有汉族士人的参与,北魏初年政治制度的创立不大可能,而按照中原传统制度改造鲜卑旧制,更非汉族士人莫属。北魏初年汉族士人对政权建设的筚路蓝缕之功,为后来北魏政治制度的发展、改革奠定了基础。”<sup>[20]</sup>虽然“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

义<sup>[21]</sup>,但更为严峻的问题同样存在:“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关右,遗黎未纯,拥节分符,多出丰沛。政术治风,未能咸允,虽动貽大戮,而贪虐未悛,亦由网漏吞舟,时挂一目。”<sup>[22]</sup>由此可知,道武帝推行统治政策恩威并施,甚至威远远大于恩,因为他所面对的是疆土广大的汉地和制度、文明迥异的汉人,真正实现汉化还需时日。

太祖幼遭艰难,备尝险阻,具知民之情伪。及在位,躬行仁厚,协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纲峻密,乃命三公郎王德除其法之酷切于民者,约定科令,大崇简易。是时,天下民久苦兵乱,畏法乐安。帝知其若此,乃镇之以玄默,罚必从轻,兆庶欣戴焉。然于大臣持法不舍。季年灾异屡见,太祖不豫,纲纪褫顿,刑罚颇为滥酷。<sup>[23]</sup>

刑罚轻重的前后变化,或许与灾异和道武帝晚年性格变化有关,或许另有隐情,开疆拓土的成功与治理中原的复杂相互交织,极易造成前后政策的反复。因此,笔者对道武帝“崇慕汉化”持怀疑态度,更多的或许是不得已而为之。

## 二 用人

对道武帝所任用的重要将相大臣较早进行关注的,有万斯同所撰《魏将相大臣年表》<sup>[24]</sup>。有学者根据该年表进行统计,道武帝时期任用将相大臣总人数25人,鲜卑人19人,汉人6人,其中士族4人。并统计道武帝皇始元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间,将相大臣总人数176人,鲜卑人占129人,汉人占47人,其中士族18人。结论是鲜卑人几乎占四分之三,汉人只占四分之一稍强,而汉人之中,士族只占三分之一多一点,仅为将相大臣总数的十分之一。因此,“士族和其他汉人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一般只担任副贰、参佐,或从事具体行政事务,或负责文教工作。这都说明北魏前期士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势力和地位还是很有限的。”<sup>[25]</sup>

更为极端的观点认为:“尽管有些士人,例如道武帝时代的崔宏、明元帝、太武帝时代的崔浩与高允等人,由于学识才智而得到君主赏识,甚至可以对朝政发挥相当的影响力,然而他们的身分,说得客气点算是客卿,坦白说来则终究还是被征服者,拓跋统治者对他们总是不免要存着几分戒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终北魏一朝这些中原士族极少能有掌握军权的机会。”<sup>[26]</sup>

中央如此,那么,在道武帝向中原推进的过程

中,是如何使中原地方州郡纳入北魏版图,又是如何让汉族士人归心向魏的呢?

论者多据道武帝重用崔宏等士人,采纳士人建议建立国家机构等认为道武帝崇慕汉化,所以重用中原世族,拓跋与汉族相处融洽<sup>[27]</sup>。更有甚者,认为“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高门,拓跋珪委任崔宏为实际的宰相,参与最高决策,领导制定国家制度,这件事有着很大的意义。它不但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开始实行政治联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说明北方士族对于促进拓跋氏封建化起着重要的作用”<sup>[28]</sup>。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道武帝时期,中原汉族士人对拓跋政权态度冷淡,甚至敌视。而北魏初入中原,热衷于征服敌国,政策的主要倾向是尚武轻文。汉族士族的政治特权得不到承认,经济利益也缺乏保障,与拓跋贵族地位悬殊。因此,道武帝部分采纳汉族政治制度完善国家机器并启用一些士人,主要是出于立国的现实需要,征服者的心理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拓跋与汉族关系不能融洽,导致汉族士人对拓跋统治者的离心倾向<sup>[29]</sup>。比较中肯的观点则认为,北魏初年推行有限的汉化制度,道武帝在利用汉人、吸取统治经验并培养本民族文化人才的同时,对汉文化保持一种防范的态度,导致天赐二年鲜卑旧制的复辟,天兴初年制定的汉化制度大多被否定,纯粹的鲜卑旧俗取代“胡汉杂糅”的制度<sup>[30]</sup>。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回避的问题是,道武帝以征服者的姿态挺进中原时,必须逐步调整与中原大族的关系,张弛有度,才能最终入主中原。因此,笔者通过考察道武帝任用汉族士人的情况,结合拓跋政权挺进中原的进程,探讨异族政权如何将汉地地方大族重新纳入新的国家政权。

日本学者宫川尚志将中原士人参与北魏政权者分为两类:一、“世族”或“门阀”或“贵族”;二、“寒门”<sup>[31]</sup>。毛汉光认为“北魏帝国以拓跋氏为核心,吸收各种种族、部落、人群,环绕着核心,构成一个一圈圈由亲而疏的同心圆,其中‘国人’界线最为重要”<sup>[32]</sup>。汪征鲁引述毛汉光的论点,继续深入:“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之后,对原有的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两种成份,即一为属于寒门或低级士族的地方强宗豪右,另一为尚文的汉族门阀士族,所采取的态度与措施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前者是加以征服且笼络后,直接吸收到自己的集团中,对后



者则一直是既斗争又联合的。<sup>[33]</sup>

汉族士人张恂曾如此说服道武帝：“金运失御，刘石纷纭，慕容窃号山东，苻姚盗器秦陇，遂使三灵乏响，九域旷君。大王树基玄朔，重明积圣，自北而南，化被燕赵。今中土遗民，望云冀润。宜因斯会，以建大业。”<sup>[34]</sup>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收中土士庶之望”<sup>[35]</sup>。对此，道武帝深加器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和那个地区固有的封建统治阶级勾结起来，并从那些士族士大夫那里吸取统治经验，建立有效的封建政治制度，并学习封建统治者的理论。这就使不同族类的上层分子在阶级利益上结合起来，汉族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从而渗透到拓跋封建统治者中间”<sup>[36]</sup>。随着挺进中原的进程，道武帝任用汉族士人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 （一）征贤纳士

（皇始元年九月）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sup>[37]</sup>

##### （1）闻其名而遣使求贤

贾彝，字彦伦，本武威姑臧人也……弱冠，为慕容垂骠骑大将军、辽西王农记室参军。太祖先闻其名，尝遣使者求彝于垂。垂弥增器敬，更加宠秩，迁骠骑长史，带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宝来寇，大败于参合陂，执彝及其从兄代郡太守润等。太祖即位，拜尚书左丞，参预国政，加给事中。<sup>[38]</sup>

##### （2）重视父祖及本人前朝任官

皇始初（李）先于并陞归顺。太祖问先曰：“卿何国人？”先曰：“臣本赵郡平棘人。”太祖曰：“朕闻中山土广民殷，信尔以不？”先曰：“臣少官长安，仍事长子，后乃还乡，观望民士，实自殷广。”又问先曰：“朕闻长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祖曰：“卿识朕不？”先曰：“陛下圣德膺符，泽被八表，龙颜挺特，臣安敢不识？”太祖又问曰：“卿祖父及身官悉历何官？”先对曰：“臣大父重，晋平阳太守、大将军右司马。父樊，石虎乐安太守、左中郎将。臣，苻丕尚书右主客郎，慕容永秘书监、高密侯。”太祖曰：“卿既宿士，屡历名官，经学所通，何典为长？”先对曰：“臣才识愚暗，少习经史，年荒废忘，十犹通六。”又问：“兵法风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习读，不能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时，卿用兵不？”先

曰：“臣时蒙显任，实参兵事。”<sup>[39]</sup>

#### （二）吸纳俘虏

在同后燕的历次战争中，道武帝不断吸纳来归的汉族士人。登国十年破慕容宝后，拓跋珪“于俘虏之中擢其才识者贾彝、贾闰、晁崇等与参谋议，宪章故实”。“这种获得优待的俘虏一般是降服的贵族、官僚与将领，往往不是真正的俘虏，他们被称为‘客’”<sup>[40]</sup>。“太祖定中山（慕容）宝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sup>[41]</sup>，张蒲不降品秩录用，更为难得。

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太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王）建曰：“慕容覆败于此，国内虚空，图之为易。今获而归之，无乃不可乎？但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太祖谓诸将曰：“若从建言，吾恐后南人创痍，绝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太祖既而悔焉。<sup>[42]</sup>

道武帝本意是在俘虏中选择有才能者充任官吏，但受到拓跋贵族势力的反对，说明吸纳汉族士人并没有成为既定政策，而是经常反复。所以才会出现宋隐对子侄“不劳远诣台阁”的叮嘱。

宋隐，字处默，西河介休人也……仕慕容垂，历尚书郎、太子中舍人、本州别驾。太祖平中山，拜隐尚书吏部郎。车驾还北，诏隐以本官辅卫王仪镇中山。寻转行台右丞，领选如故。拜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许。寻以母丧归列人。既葬，被徵，固辞以病，而州郡切以期会，隐乃弃妻子，间行避焉。后匿于长乐之经县，数年而卒。临终谓其子侄等曰：“苟能入顺父兄，出悌乡党，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则足矣（774年）不劳远诣台阁。恐汝不能富贵，而徒延门户之累耳。若忘吾言，是为无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不归食矣。”<sup>[43]</sup>

宋隐对拓跋政权的顾虑也许还与其叔父宋洽被道武帝所杀有关，迫于拓跋政权强大的军事压力而归降，但内心及其忧惧不安。

隐叔父洽，为慕容垂尚书。太祖之围中山也，洽率所领专守北围。当洽所统，官军多被伤杀，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杀之。子顺、训并下腐刑。<sup>[44]</sup>

但道武帝并没有因为忿恨宋洽而株连到宋隐，反

而对宋隐一再重用。这恰恰印证了道武帝“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的初衷。

崔逞被杀又是道武帝前后反复的例证,因“取榷可以助粮”而衔恨,因称姚兴“贵主”而动怒,杀崔逞又后悔;“自是士人有过者,多见优容”。<sup>[45]</sup>逞之内徙也,终虑不免,乃使其妻张氏与四子留冀州,令归慕容德,遂奔广固。逞独与小子颐在平城<sup>[45]</sup>,崔逞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厄运终归还是降临到他的头上。所以,道武帝在对待汉人的态度上,摇摆不定,这种心态正说明一位异族统治者面对中原土族时的彷徨:既要吸纳土人,又要制约土人;既要学习中原制度,又要保持征服心态。作为统治者的对立面,中原土人的心理也并不单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实功利比一味排斥外族的心理更为现实,也更为可信。为了生存,为了保全家族生命,不得不放弃知识分子的尊严。

对于道武帝的成就,制度改革并不是很成功。各种原因,马长寿作了如下分析:永嘉乱后“胡风国俗,杂相揉乱”,与汉家旧仪相去甚远,拓跋入主中原,草原制度不宜于中原,而崔宏、邓渊等对落后制度又不敢径行提出改革<sup>[46]</sup>。但是,无论如何,作为先导者,筚路蓝缕,对后世的启蒙仍然是不容忽视的。由于皇权的争夺,道武帝成了牺牲品,但他开拓中原的努力,引导拓跋政权与汉民族不断磨合,最终为孝文帝全面汉化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 
- [1]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 1987 年,第 240 页。
- [2]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第 139 页。
- [3] 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 年第 2 期。
- [4] [39] 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235、218 页。
- [5] 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第 1 页。
- [6] [7] [10] [14] [15] [17] [37]《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
- [8]《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 [9] 魏鹏举《北朝前期内朝机构考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编《北朝研究》第一辑(1999 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

- [11] 日·澹添庆文《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第 37~38 页。
- [12]《魏书》卷八四《儒林传》。
- [13] [39]《魏书》卷三三《李先传》。
- [16] [20] 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第 26、52 页。
- [18] 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第 67 页。
- [19] [26] 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台北稻禾出版社 1995 年,第 23、25 页。
- [21]《魏书》卷八五《文苑传》。
- [22] [34]《魏书》卷八八《良吏传》。
- [23]《魏书》卷一一《刑罚志》。
- [24] 清·万斯同撰《魏将相大臣年表》,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1955 年,第 1~2 页。
- [25] [28] 刘琳《北朝土族的兴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
- [27] 林瑞翰《北魏之汉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2 年第 39 期;陈汉平、陈汉玉《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民族研究》1982 年第 5 期。
- [29] 莫久愚《北魏前期政治中的民族问题和崔浩之诛——与陈汉玉、陈汉平二同志商榷》,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
- [30] 何德章《鲜卑代国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北朝研究》1993 年第 2 期;何德章《北魏初年的汉化制度与天赐二年的倒退》,《中国史研究》2001 年第 2 期。
- [31] 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转引自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
- [32] 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第 44 页。
- [33] 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70 页。
- [35]《北史》卷二一《张袞》。
- [36] 唐长孺《拓跋族的汉化过程》,《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第 597 页。
- [38]《魏书》卷三三《贾彝传》。
- [41]《魏书》卷三三《张蒲传》。
- [42]《魏书》卷三〇《王建传》。
- [43] [44]《魏书》卷三三《宋隐传》。
- [45]《魏书》卷三二《崔逞传》。
- [46]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第 52 页。